

我国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 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

杨 超

[摘要] 本文对我国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研究,并讨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并不大,但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以及对日、韩的贸易逆差的绝对规模处于上升趋势;从地区层面看,贸易失衡主要由贸易规模最大的几个省份引起;加工贸易占比越高的行业,贸易顺差规模越大。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随着引进的外资类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我国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小;我国与欧美国家的“非对称投资关系”是引起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发展更为对称的投资关系是缓解贸易失衡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今后的经贸谈判中,提高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准入仍是我国需要突破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贸易失衡; 结构特征; 形成机制; 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21) —01—0041 (07)

[作者] 杨 超,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一、引言

贸易失衡,是指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往来过程中贸易顺差或逆差规模持续过大的现象。2019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2.92万亿元,较前一年扩大25.4%,服务贸易逆差1.5万亿元,同比下降10.5%,总贸易顺差1.42万亿元。2018、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69%、2.95%,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顺差规模并不大。^①但我国经济体量大,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速度快,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

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财富分配矛盾日渐突出,贸易不平衡问题经常被发达国家政府作为国内矛盾的“挡箭牌”。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两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涉及货物规模、时长、波及范围均前所未有的贸易纠纷,两国虽已于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仍有价值约为3700亿美元产品关税未被取消,涉及中国对美出口2/3的产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大流行的背景下,未来的中美贸易协定执行和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长期以来,货物贸易失衡是国际经贸谈判的重点问题,历史上美国曾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贸易失衡问题而爆发诸如关税战、汇率战等经贸摩擦。尽管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但与发达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顺差获得更多的关注,且已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因此,弄清货物贸易顺差的结构特征及其原因,对于更好地理解货物贸易顺差的本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印度和巴西的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分别为-7%、2.8%。

历史经验表明, 贸易失衡越严重的贸易关系中, 贸易纠纷发生的频次往往也越高。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关于贸易争端解决案例的数据显示, 2002~2019年, 美国作为投诉人将中国上诉至 WTO 的案例有 23 起, 居美国所有贸易伙伴首位, 而中国作为投诉人将美国上诉至 WTO 有 16 起, 占中国上诉案例总数近 70%; 墨西哥、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失衡也经常引起贸易摩擦, 如特朗普政府在多个场合声明, 在美欧双边贸易中, 美国产品很难进入欧盟市场, 而欧盟却以免税或是非常低税率下将其产品发往美国市场, 所以美国受到了欧盟不公正的对待。^① 此外, 贸易的流动总是伴随着资本的流动和资产债务存量 (国际投资头寸) 的调整, 在缺乏纠正政策干预的情况下, 贸易赤字国的债务会不断增加, 顺差国的债权会不断上升。长期性的全球性失衡会导致贸易国之间资产-负债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一旦经济陷入衰退, 债务国的财政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会随着国际借贷关系被放大, 不利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② 历史上由全球不平衡引致的经济危机并不罕见。^③

因此, 贸易失衡问题的减缓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平衡而稳定的贸易关系,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将重点回答以下问题: 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结构特征是什么? 造成我国货物贸易逆差结构性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国应对货物贸易失衡的可行政策有哪些?

长期以来, 文献依赖于宏观经济学中储蓄-投资框架分析双边贸易失衡, 如大量研究认为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中国储蓄过高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2-3] 本文认为, 宏观变量的确是驱动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 然而仅用宏观变量分析我国贸易失衡规模会掩盖重要的细节, 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差异较大, 将贸易失衡问题在地区、行业层面进行解构,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下面将从国际生产网络、国内不同行业、地区对国际生产网络的依赖以及贸易类型等对贸易失衡的结构、原因展开分析。

二、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长期以来, 欧美等发达国家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 增加对欧美国家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期, 国际收支结构趋向合理, 2018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 GDP 之比为 0.4%,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4] 然而, 就货物贸易而言,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程度在不断增加。

1. 特定国别双边贸易失衡

过大的贸易顺差和逆差规模都是贸易失衡的重要表现。

图 1 列示了中国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失衡演变趋势。可以看出, 2000 年以后,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程度不断加大。一方面, 我国与欧美国家保持着规模较大的贸易顺差; 另一方面, 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保持着规模较大的贸易逆差。可以发现, 我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规模开始明显地增长, 2000~2019 年间, 我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平均增速为 13.4%, 对欧盟贸易顺差平均增速为 14.9%, 而对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上游产业国家的贸易逆差平均增速为 14.7%。金融危机以后, 中美贸易失衡规模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而中欧的贸易失衡规模趋于稳定。而近年来, 中国与日韩等贸易逆差国的贸易失衡程度也有逐步扩大倾向。

2. 国内地区贸易失衡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由东向西、由点到面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40 余年间国内不同地区对国际生产网络的融入程度差异很大, 进出口平衡状态也不尽相同。海关数据显示, 贸易规模最大的 9 个省份的进出口占全国贸易总额的 80% 以上。因此,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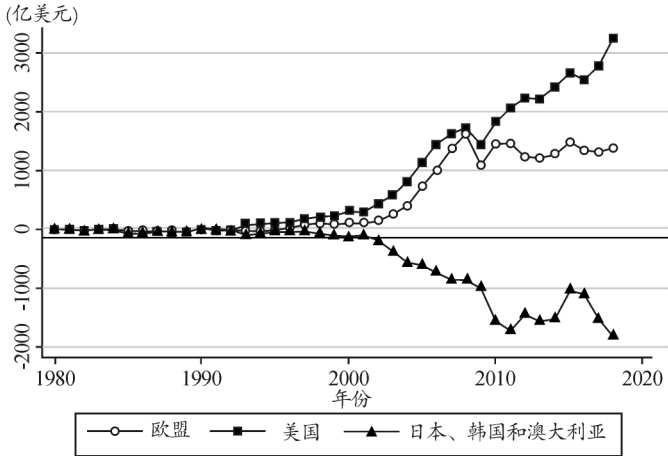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状况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0 年。

① 特朗普又谈贸易问题: 欧盟对待美国不公平,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29/c_129801068.htm。

②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全球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盈余国家 (美国和法国) 与赤字国家 (德国与英国) 未能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贸易、资产负债不平衡等问题。

国贸易平衡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主要贸易大省的贸易收支状况，贸易总额数据往往掩盖了国内各地区贸易状态的差异。图2对前9位贸易大省的贸易盈余状况进行了描述，可以发现，浙江、广东和江苏的贸易顺差规模较大，而上海、北京和天津具有较大的贸易逆差。贸易大省所面临的贸易失衡是中国整体贸易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1报告了贸易大省的对外贸易收支状况以及对主要经济体的盈余和赤字规模分布。按照各地区对欧美贸易顺差规模由大到小排列，浙江贸易顺差规模为2144.22亿美元，其中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占贸易顺差总规模一半以上；广东对外贸易顺差2014.97亿美元，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占80%以上；江苏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规模为1305.33亿美元，反而高出贸易顺差总额133亿美元。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欧美贸易顺差最大的3个省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都要大于出口，广东和江苏对日韩两国的贸易逆差分别是484.82和346.23亿美元（见表1）。此外，山东、辽宁、天津、上海和北京的对外贸易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其中规模较大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和天津，贸易赤字分别为1238.17、708.03和496.37亿美元。不同地区贸易平衡状态迥异，与不同地区的产业分布、从事的贸易类型紧密相关。如果一个地区对于高度依赖国际生产网络的产业越多，或者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则其贸易失衡的可能性会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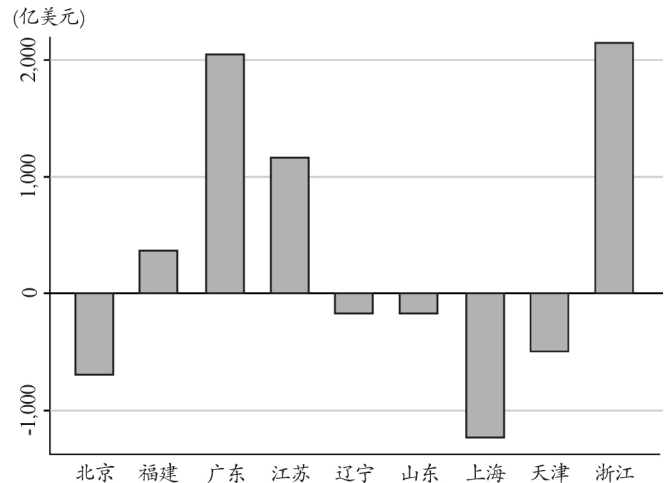


图2 贸易大省的进出口平衡状况 (2018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2018年。

表1 2018年中国主要地区贸易平衡状况

单位：亿美元

地区	(1) (出口) 减 (进口)	(2) 与欧美	(3) 与亚洲	(4) 其中: 与日韩
广东	2041.97	1701.00	23.52	-484.82
江苏	1171.94	1305.33	0.09	-346.23
浙江	2144.22	1259.92	440.07	-1.92
福建	371.57	324.06	137.48	27.87
山东	-172.16	321.96	252.56	145.80
辽宁	-180.96	-85.44	17.96	31.41
天津	-496.37	-153.03	-68.66	-117.17
上海	-1238.17	-349.65	-433.18	-274.87
北京	-708.03	-948.99	-956.93	-130.63

注：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得出。2018年排名前9位的贸易大省占全国贸易比重82%左右，历年份额都保持在80%以上。表中第1~4列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各地区出口与进口总额相减。

3. 贸易类型：加工贸易的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一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关数据显示，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贸易总额近58%，为历史最高水平，2010年以后，加工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在40%以上，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224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额19481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42%。相关统计显示，2000~2007年间，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占全部加工企业数目的80%以上。^[5]这类“两头在外”的贸易方式，为对外贸易总额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失衡规模处于较高的水平。图3将贸易顺差根据贸易类型进行简单地分解，其中黑色图例表示加工贸易净出口，白色图例表示一般贸易净出口，每一年的贸易顺差等于一般贸易净出口加上加工贸易净出口。可以发现，2000年以后，来自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始终高于一般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而在金融危机期间，一般贸易出现了贸易逆差，由于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足够大，使得中国仍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规模；从2014年开始，随着一般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地位的提

占贸易顺差总额的 36% 和 64%，加工贸易的净出口仍在贸易顺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4. 行业失衡：行业越依赖国际生产网络，贸易失衡的规模也越大

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少数行业或产品组。中国对美顺差第一大类是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中国海关编码第 16 类，共 22 类），① 2018 年对美出口额为 2222 亿美元，占对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 46.4%。该行业对美顺差 1841 亿美元，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 57%。与此同时，中国对日韩贸易逆差最大的行业也集中于海关编码的第 16 类，其中对日本逆差 248 亿美元，对韩国逆差 732 亿美元，占两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73% 和 76%。因此，从贸易的行业分布看，对美国顺差规模最大的行业，往往也是对日韩赤字规模最大的行业。

对于越依赖国际生产网络的行业，其贸易失衡的规模也会加大。如，机械器具、电气设备是最依赖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的行业，② 加工贸易占行业贸易总额比重达 60% 以上，③ 而 2018 年广东、江苏和浙江，机械器具、电气设备行业的出口在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2%、19% 和 7%，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以上 3 个省份具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规模。

5.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贸易失衡的影响

从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减缓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影响不大。图 4 给出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严重的行业或产品类，在贸易摩擦前后的贸易顺差/逆差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乎没有产品或行业在近 3 年内改变了贸易平衡状态，2017 年处于严重贸易失衡的产品，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仍处于贸易失衡的状态，因此贸易平衡状况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对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较突出的行业（如机器、电气设备及其零件），2018 年相对于 2017 年规模有所扩大，2019 年后顺差规模略有降低，但是幅度不是很明显。而对于贸易逆差比较明显的行业，2019 年的逆差规模较前两年有较为明显的降低。因此，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并不能起到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

三、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

1. 不对称的双边投资关系是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

不对称的双边投资关系在这里指的是，当前和未来，美国来华投资规模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这会对中美双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理论而言，美国企业可以有两种方式服务中国市场：① 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贴近中国市场服务消费者；② 在美国生产，通过出口的方式服务中国消费者。③ 两种方式虽然都能起到服务中国市场的目的，但是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如果类似于星巴克这样的企业将产品通过出口而不是设立连锁店的方式服务中国消费者，就会增加美国对华出口的规模。换言之，美国在华企业的销售对出口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而随着投资量的不断扩大、市场寻去型 FDI 比重不断增加，FDI 对出口的替代效应也会越强。在华美资企业的销售收入不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数据的情况下，会显得美国对华出口不足。由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起步较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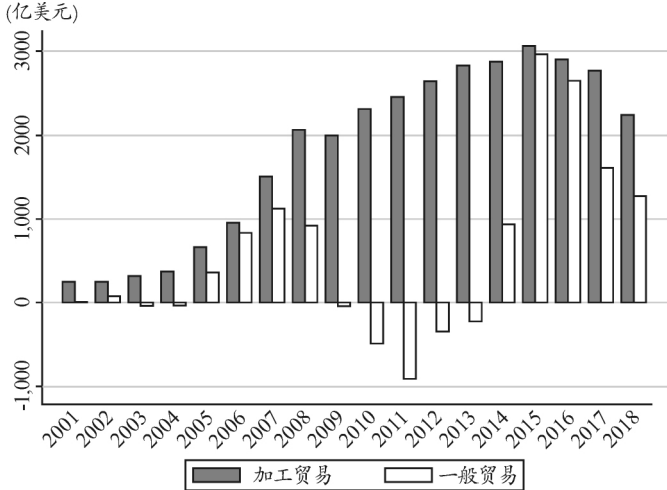


图 3 加工贸易净出口与一般贸易净出口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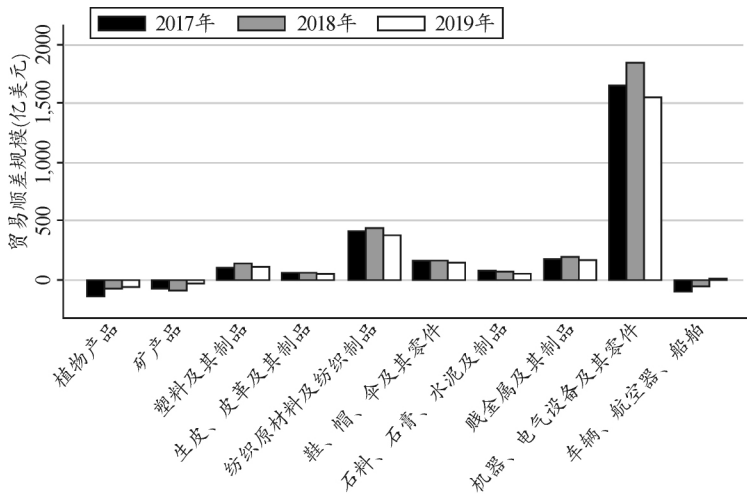


图 4 加征关税对主要产品类贸易失衡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2020 年。

① 其次第 20 类杂项制品（包括玩具、运动用品、家具）和第 11 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排名前三类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近 70%。

② 2018 年行业出口额为 10933 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为 6761 亿美元，占比 62%。

③ 为了便于分析，这里未考虑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服务第三方市场为目标的情况。

且投资规模远不如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企业服务美国市场的方式主要以出口为主，投资对出口形成不了替代。再加上部分来自美国的企业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将组装好的最终品出口至美国市场，将进一步加重中美贸易失衡。

(1) 不对称双边投资关系的来源

当前，我国与欧美国家的不对称投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市场准入的不对称。近年来，中国对外资开放大门越来越大，而欧美对华投资审查标准越来越严。一方面，在华美国商会的各类商业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在华企业（60%以上）仍然将中国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市场，并将中国消费增长和中产阶级扩大视为最重要的商业机会。^① 中国在金融、制造业等领域新一轮开放的推进，有望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的追加投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逐步收紧对来自中国企业投资的审查标准，使得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越来越高。近年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多次否决了来自中国的收购交易，^②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权限。因此，当中国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时，美国政府却相背而行，两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具有不对称性。

第二，投资规模的不对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始于1982年，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开始于2002年。图5给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双向投资规模。可以看出，近4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2010年以后，中国开始加快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但规模仍小于美国对华的投资。2010~2018年间的FDI存量数据显示，美国对华投资规模是中国对美投资规模的7.8倍。2016年以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步伐明显放缓，而美国对华投资一直在稳步上升。因此，中美双边投资在绝对规模层面具有不对称性。

(2) 日、韩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说明对称的双边投资关系有利于贸易失衡的缓解

从历史数据看，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大部分国家保持贸易逆差。日本和韩国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占出口总额分别在30%和35%左右，^③ 对美国形成巨额的贸易顺差，曾经一度成为美国向日本发起“贸易战”的重要理由。那么日本是如何逐步缓解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的？众多研究显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重要的替代作用，是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不到20%。与此同时，根据本文可以找到的最早数据，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存量一直占日本海外投资存量的30%以上，其中最高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高达60%（如图6所示）。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历程说明，良好的双边投资关系对于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日本和韩国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也对缓解两国与美国的贸易失衡起到关键的作用。一些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生存的产业转移海外后，日韩两国的部分出口实际上转移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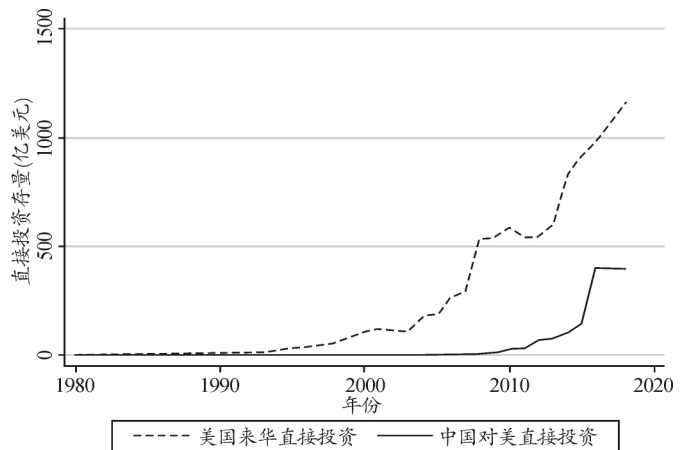


图5 中美双边投资存量 (1980~2018年)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EIC，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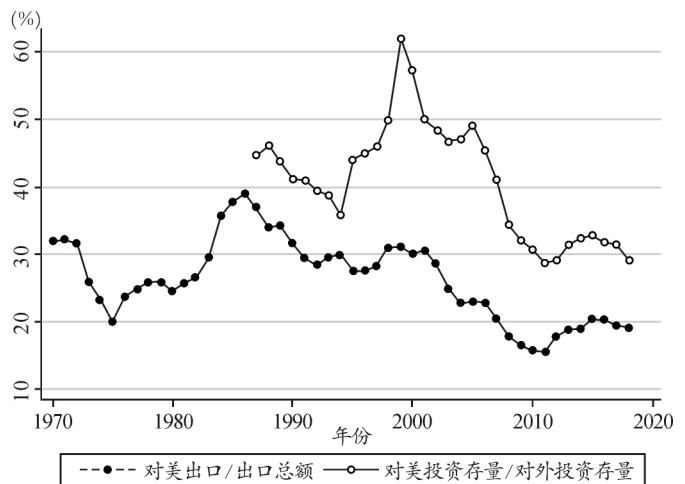


图6 日美双边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EIC，2019年。

① “在华美企营收在不确定性中继续增长”，《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报告》，<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eloitte-amcham-2019-china-business-climate-survey-report.html>。

② 如CFIUS否决了中国博通对美国高通的并购交易；下令中国“昆仑万维”出售此前收购的美国社交网络公司Grindr，以及要求“碳云智能”出售美国互联网医疗公司PatientsLikeMe的股份。

③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与总出口之比最高水平为21.5%，发生在2002年。

产业接受国的出口，进而大幅降低了两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

2. 加征关税和胁迫贸易伙伴调整汇率等举措无法改变美国贸易失衡的局面

中美贸易失衡在洲际层面看，具有历史延续性。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开始起飞，受日本对美出口的迅速增长所驱动，美国对日本乃至亚洲的贸易逆差开始于 1965 年。① 自此以后，美国开始了对亚洲长达 50 多年的贸易逆差，并且该趋势延续至今，逆差规模仍在逐年增长。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平衡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日贸易占主导地位阶段。1965 ~ 1980 年间，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扩大 77 倍，1980 年的逆差规模高达 1966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为 1218.2 亿美元，占美国对亚洲逆差规模 62%。

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快速增长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拉开了中美国长期贸易失衡的序幕。IMF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于 1983 年开始对美贸易顺差，规模约 30.4 亿美元，自此以后的 35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平均每年以 23% 的幅度增长。2018 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达 4.19 万亿美元，占美国贸易赤字的 68%。1983 ~ 2018 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中的比重从 0.85% 上升至 2018 年的 68%（如图 7 所示），而同一时期，美日贸易逆差在“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的比重从 60% 下降到 11%。换言之，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关系从美日贸易占主导地位，演变成中美贸易占主导地位，而美国与亚洲国家整体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未曾发生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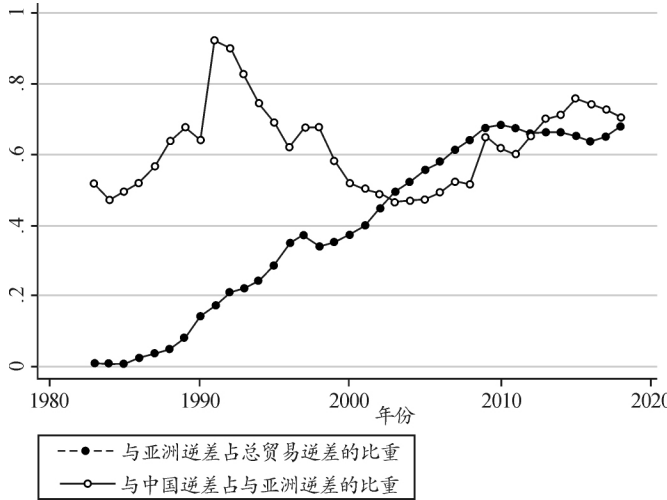


图 7 美国的“亚洲贸易逆差”以及中国在“亚洲贸易逆差”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尽管贸易失衡一直是引发关税战、汇率战等经贸摩擦的重要来源，但发起贸易摩擦无法改变美国贸易失衡的基本格局。美国历史上通过关税、汇率而改变贸易失衡的努力都失败了。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对外贸易部门从盈余快速转变为赤字，当时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贸易伙伴的开放程度并不对等，贸易伙伴国对来自美国的产品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产品的销售，引起美国贸易部门竞争力下降。美国将矛头指向亚洲国家的汇率问题，美国将韩国等经济体列入汇率操纵名单，1992 ~ 1994 年间中国（大陆）首次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此，逼迫亚洲国家的汇率升值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局面。

四、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正趋于平衡，然而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程度仍在不断扩大。这一方面与我国的引进外资的类型、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有关；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经济体非对称的投资关系也是引起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两条政策启示：

第一，随着引进外资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我国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小。首先，外资过去几十年间在推动我国出口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中国作为产品组装的最后环节，这些最终品并没有被中国国内市场消费，而是以出口的方式运回发达国家，再加上中国的产品中承担了许多来自上游国家和产业的增加值，会进一步推高我国的贸易顺差。随着中国步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引进的外资类型会从生产要素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外资企业的销售会偏向国内而非出口，这将有利于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其次，我国的制造业正处于快速转型升级时期，意味着有大量的国内企业会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因此高质量的外资流入、以及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升级，共同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趋向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最后，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国内部分对劳动成本敏感的行业正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占比预期会进一步降低。欧美对中国的部分逆差会慢慢向越南、泰国、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转移，这与中国对外开放后逐步

① 为了统计便利，本文的亚洲包含：中国大陆地区、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体。

取代日本和韩国,成为亚洲地区对欧美最大顺差国,在路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应继续寻求与欧美国家建立平衡的双边投资关系。历史经验和经济学理论的启示在于:贸易失衡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它与投资、全球化的起伏高度相关,欧美国家不能一方面拒绝来自中国的投资,另一方面却将贸易失衡的责任推向中方。唯有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包括贸易失衡在内的各种经济难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全球大流行,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为中美、中欧的经贸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使得推动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难度显著增加。但今后的经贸谈判中,提高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准入仍是我国需要取得突破的重要方向,唯有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包括贸易失衡在内的各种经济难题。

参考文献:

- [1] Turner D, Spinelli F. Interest-Rate-Growth Differentials and Government Debt Dynamics [J]. OECD Journal: Economic Studies, 2013, 2012 (01): 103 - 122.
- [2] Feldstein M. Resolving the Global Imbalance: The Dollar and the US Saving Rat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 22 (03): 113 - 25.
- [3] Yang D T. Aggregate Savings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26 (04): 125 - 46.
- [4] IMF. 2019 External Sector Report: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Adjustment [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onetary and Capital Markets Department, 2019.
- [5] Liu Q, Lu R, Yang C.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World Economy, 2020, 43 (01): 146 - 169.
- [6] 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 [7] Wakasugi R. Is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ub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4, 6 (01): 45 - 52.

China's Foreign Trade Imbalance: Structure Features, Mechanis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YANG Chao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structure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mbalance, and conclude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findings are as the following: The size of the China's trade imbalance is not high compared to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but China is running large trade surplus with E. U. and U. S., and large trade deficit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ina's trade imbalance is driven by unbalanced trade of major trading provinces; Industries with large percentage of processing trade can lead to trade imbalanc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s China's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become more domestic market-driven, the size of China's trade imbalance will be reduced dramatically; The unsymmetrical Sino-US and Sino-EU investment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so a more balanced investment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alleviate trade imbalance. Therefore, future trade negotiations should be focusing more on demanding market access in EU and US markets.

Key Words: foreign trade imbalance; structure features; mechanism; policy implications

责任编辑: 曹羽茂